

- Treasure, Geoffrey R. 2013. *The Hugueno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yacke, Nicholas, ed. 1998. *England's Long Reformation: 1500-1800*. London: UCL Press.
- Wimmer, Andreas 2013. *Waves of War: Nationalism,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18. *Nation-building: 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and Others Fall Ap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immer, Andreas and Brian Min. 2006.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 Explaining wars in the Modern World, 1816-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6): 867-897.
- Wimmer, Andreas and Feinstein, Yuval 2010.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 1816–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5): 764–90.

## 【论 文】

### 苏联模式：驾驭民族主义的历史实验<sup>1</sup>

周陆洋<sup>2</sup>

苏联民族模式在世界历史占据重要地位，是传统帝国秩序面对民族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冲击的回应。苏联建立的背景是世界性的帝国危机。由于工业革命、世俗化祛魅、君主制危机、民族主义崛起等因素，帝国作为一种政治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挑战。各大传统帝国都在寻求应对平衡策略，既要积极回应殖民地精英的民族主义诉求，又要尽可能保持疆域统一。由此衍生的帝国保存方式多种多样，并大体分为三种路径，一种是“民族化帝国”，以原先的核心族群为基础，或拓展其概念、或发明“帝国民族”（imperial nation），把帝国整合为类似单一民族国家的新单位，例如法国<sup>3</sup>。另一种是“联邦化”，允许殖民地以多种形式自治、自决，同时通过邦联、贸易协定等方式留在原宗主国范围内，规避硬脱钩造成的经济社会混乱<sup>4</sup>；特定形势下，原帝国的核心与边陲甚至可以组成较为平等的姊妹联合体，如奥匈帝国和葡萄牙-巴西二元王国<sup>5</sup>；第三种方案则是基本保留帝国结构，从种族和生物观念区隔于其他族群的核心民族，以此确保对边陲的绝对控制，比如德意志帝国<sup>6</sup>。苏联模式借鉴了上述三种模式的元素，但不同于任何一种，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后殖民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具有独特的世界历史意义。

苏联民族模式具有几个关键要素：一、族群民族化：将原先沙俄帝国境内的族群识别或重新建构为民族，由苏维埃国家为其发展特定的民族语言，定义民族风俗和文化艺术；二、领土化：为各个民族划定领土，包括把原先散居在各地的被划为同一民族的人迁入一地集中居住，并建立自治单位，这些自治单位既可以是加盟共和国，也可以是加盟共和国下属的民族自治共和国、自治州；三、本地化：民族区域重点培养和任用本民族干部，通过强调其民族身份推行国家政策；

<sup>1</sup> 本文刊载于《二十一世纪》2021年12月号，第188期，第22-37页。

<sup>2</sup> 作者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sup>3</sup> Berger, Stefan, and Alexei Miller (Eds.). 2014. *Nationalizing Empires*. Budapest;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Darwin, John. 2013. "Empire and ethnicity." Pp. 147-71 in *Nationalism and War*, edited by Siniša Malešević and John A. Hall.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p>4</sup> Betts, Raymond F. 2004. *Decoloniz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Good, Mary-Jo DelVecchio (Ed.). 2008. *Postcolonial Disord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gden, Anthony. 1995. *Lords of All the World: Ideologies of Empire in Spain, Britain and France c. 1500-c. 180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up>5</sup> Fieldhouse, David Kenneth. 1966.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sup>6</sup> KOLSTØ, PÅL. 2019. "Is Imperialist Nationalism an Oxymor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5(1):18-44.



四、集中化：民族自治仅限语言文化和特定经济技术层面的法律问题，各民族在政治上服从严格的列宁主义原则，因此它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联邦制；五、去俄罗斯化，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进行限制，在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也是最大的加盟共和国，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内部建立了多个非俄罗斯共和国和自治区，允许非俄罗斯人族裔采用本民族语言教育和出版<sup>1</sup>。去俄罗斯化集中显示了苏联模式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苏联没有否定和取消俄罗斯族，但采取了实质性制度设置来遏制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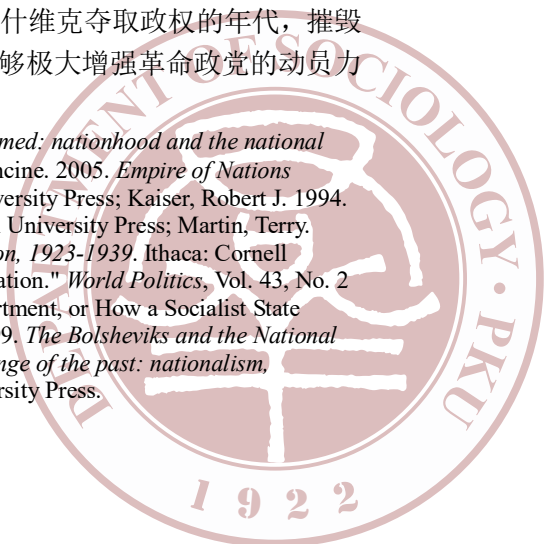
本文分三部分介绍苏联民族模式的历史。第一部分解释苏联民族模式的革命历史起源，进一步阐释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在苏维埃国际主义的框架下发明民族主义，试图通过驾驭民族主义引领世界反殖潮流，推进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第二部分解释苏联民族模式在革命后的延续，重点说明苏联的双重反向运动：一方面培育和强化各民族的政治文化认同，一方面又通过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加固民族之间的一体化。第三部分分析苏联民族模式在后苏联时期欧亚空间的复杂历史遗产：苏联时期的民族发明和一体化战略并不完全是徒劳的努力，而是留下了深刻的路径依赖。本文强调以下基本观点：苏联民族模式并不是建设常规民族国家的制度，而是一种服务于全球扩张和世界革命战略的制度设计；苏联民族模式虽然存在自掘坟墓的民族主义孵化器倾向，与此同时也积极通过各种权力手段利用和驾驭民族主义浪潮；苏联民族模式在塑造一体化方面的成就不容低估，对苏联继承国家的民族认同、地缘政治具有基础性影响力；苏联解体具有复杂多重的历史原因，苏联民族模式与苏联政治解体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待继续探索。

## 一、起源：对帝国-民族国家转型的革命性回应

布尔什维克为何执意将俄国改造为一众民族国家的联盟？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基于沙俄的多民族性。俄国是地域辽阔的多族群帝国，俄罗斯人在人口数量上勉强超过半数。然而，简单的族群多样性并不能回答下列疑惑：为甚么苏联会区别于多数现代帝国、执行压制和消解主体民族的制度设计，而不是采取同化政策、製造“帝国民族”？为甚么苏联执意要在边陲地区建立形式上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授予特定族群自治权和自治区？苏联在彰显少数族群多样性的过程中，为甚么刻意从语言、地域、文化等“客观基础”层面界定民族，而不是主观的公民认同？为甚么苏联政权会公开赋予不同族群差异化的官方政治地位——有些族群获得了加盟共和国，有些是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还有些并不被承认为民族？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植根于苏俄革命进程。

苏联民族模式的最基本历史背景是人类社会在“世纪末”（Fin de Siècle）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这一转型自早期现代欧洲就已开始，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以普选制、普遍兵役制和全民义务教育为特征急剧加速，并且凭藉西方主导的殖民体系扩散到全球，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随着德奥、奥斯曼、沙俄等传统帝国解体达到高潮。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年代，摧毁帝国、建立民族国家是绝对的政治正确。迎合这一政治正确固然能够极大增强革命政党的动员力

<sup>1</sup> 关于苏联模式核心特征的论述，见 Brubaker, Rogers. 1996.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rsch, Francine. 2005. *Empire of Nations: Ethnographic Knowledge &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aiser, Robert J. 1994. *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Terry. 2001.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oeder, Philip G. 1991.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2 (Jan., 1991), pp. 196-232; Slezkine, Yuri. 1994. "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Slavic Review* 53(2):414-52; Smith, Jeremy. 1999. *The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17-23*.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uny, Ronald. 1993b.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与合法性，却也给信奉“跨国阶级联合重于民族战争”（Szporluk, 1991）的传统欧洲工人运动提出了严峻挑战：苏联民族模式由此溯源。它对民族国家转型的回应是一种创造性综合：民族国家在长期会随着生产力发展而消亡，但在短期则是“必要的恶”，是统一市场形成、生产力进步、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制度所必需的政治外壳；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排斥跨民族的革命大联合，因此新兴的民族解放运动仍须处在统一的无产阶级集中领导下。苏联民族模式最重要的独特之处是由此衍生的二分法：布尔什维克坚信语言文化和政治经济是两个能够彼此分离的维度——社会主义运动可以一边庆祝弱小民族的语言、地域、文化独立性来取代传统殖民帝国，一边通过政治经济上的高度集中来推进革命和现代化。这构成了苏联民族模式的革命起源。用美国社会学家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的术语来说，苏联在起源上是一个族群民族主义与公民超民族主义的组合（Brubaker 1992）。

苏联民族模式的实质是以符合民族国家潮流的方式保留沙俄帝国的疆域，其对“统一性”的执念始终居于彰显族群多样性之上，但往往受到忽视。对统一性的执念具有多重来源。除了列宁主义所要求的无产阶级政党原则，实际的革命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说 1917 年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对于“民族自决”还有某些稚嫩的幻想，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很快意识到沙俄帝国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经济和防御整体，任何人要稳固执政必须持续获取来自乌克兰的粮食和煤矿、高加索的石油、中亚的棉花，以及波罗的海沿岸、芬兰的地缘政治屏障。这意味着重要的边陲地区都不能置身革命之外，否则革命无法进行<sup>1</sup>。对统一性的执念也是布尔什维克与其对手竞争的产物。沙皇垮台后党派林立，边陲民族运动爆发，然而对布尔什维克构成最严峻挑战的大部分全俄政党都主张保留统一的俄国，而不是任由边陲地区脱离，例如：立宪民主党要求在原沙俄疆域内建立自由的联邦制度，具有民粹派色彩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则坚持建立俄语和俄罗斯文化主导的新国家，孟什维克右翼也主张限制分离运动，在统一的俄罗斯框架内推进革命，而 1918 年兴起的白卫军更是坚持俄国不可分裂。这些对手的强大影响力迫使布尔什维克不能在“民族自决”、“肢解俄国”口号上过于认真，而是必须借鉴采纳对手的思想纲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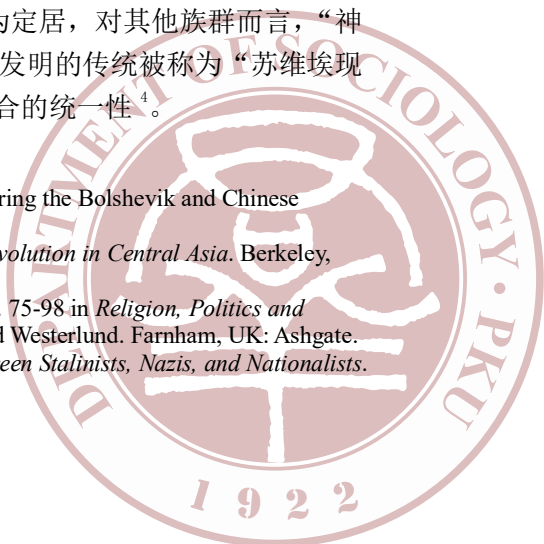
在边陲地区进行的文化与政治革命并非单纯的“民族自决”，而是增强苏维埃统一性的微妙手段。通过支持民族语言教学、鼓励宗教自由等立即可见措施，布尔什维克争取少数民族支持革命运动、反对白卫军的进攻，从而深化政治上的跨族群统一。这一“文化-政治”组合率先在共产主义者占据绝对优势的鞑靼地区实现——通过建立示范性的民族共和国，布尔什维克向沙俄境内和整个东方殖民世界宣告了一种帝国重组模式。在随后的革命中，苏俄政权与民族地区的进步运动、下层民众结成同盟，在民族政治解放的框架内开展阶级革命，消灭原先的统治集团，釜底抽薪式地取消了这些旧精英依附民族主义、勾连境外势力脱离苏俄的可能性<sup>2</sup>。苏联模式对族群文化的重新发明同样是巩固统一性的手段。在布尔什维克话语中，革命前“族群文化元素”包含太多与进步不符的内容，因而需要按照统一的标准加以改造：乡村土语需要进行现代化从而转化为能够言说工业科技和城市生活的语言；对妇女外出工作的父权制限制必须解除；一些传统的仪式风俗被批判为损害公共健康和人口质量；渔猎游牧生活需要变为定居，对其他族群而言，“神秘主义”以及阻碍族群之间沟通的宗教必须取消<sup>3</sup>。经过苏联重新发明的传统被称为“苏维埃现代性”，融合了俄罗斯和苏联其他族群的文化元素，是一种族群混合的统一性<sup>4</sup>。

<sup>1</sup> Zhou, Luyang. 2019.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as Foes and Friends: Comparing the Bolshevik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3):313-50.

<sup>2</sup> D'Encausse, Helene Carrere. 1988. *Islam and the Russian Empire: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up>3</sup> Sundström, Olle. 2015. "Shamanism, Politics and Ethnos-Building in Russia." Pp. 75-98 in *Religion, Politics and Nation-Building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edited by Greg Simons and David Westerlund. Farnham, UK: Ashgate.

<sup>4</sup> Amar, Tarik Cyril. 2015. *The Paradox of Ukrainian Lviv: A Borderland City between Stalinists, Nazis, and Nationalist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在王朝合法性崩解、旧疆域无法按照传统帝国模式重组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极力显示自己对划时代变化的积极态度，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稀释和重塑作为前帝国中心文化属性、带有殖民征服色彩的“俄罗斯性”。沙俄断续曲折地采取了民族国家化政策，以沙皇制度、俄语、东正教和军事征服精神推进俄罗斯化。这些政策一概被视为革命对象，连同“俄罗斯性”一概受到批判——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将“俄罗斯性”与旧文化等同，认为后者与宗教、专制和殖民存在难以分割的联繫且总体上知识贫乏、与现代启蒙成就脱节<sup>1</sup>。然而，对“俄罗斯性”的再造也是革命的一部分。“俄罗斯”的概念被去主观化，成为了辽阔地理、丰富自然环境、雄厚工业基础和欧亚特殊中间位置的代名词，具有了世界革命基地和后方的意涵。遵照列宁“两个俄国”的指示（革命的俄国和反动的俄国），对俄国文化革命传统的系统性发掘也全面展开，除了布尔什维克零散提及的“革命民主作家”，苏维埃政权开始大规模整理古典文学作品，将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托尔斯泰（Leo Tolstoy）、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的文学遗产重塑为现代化教科书、反专制斗争经典和公民文化读本。在苏维埃政权的资助下，对革命运动史、劳动和工业史等传统史学薄弱领域的研究也在内战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起步。布尔什维克暗中借用人們对波兰、立陶宛等俄罗斯传统“重要他者”的敌对情绪，使红色爱国主义在苏波战争中达到巅峰。通过对“俄罗斯性”的巧妙再造，布尔什维克再一次将俄罗斯和俄语文化置于革命的先锋地位。

苏联民族模式对统一性的追求并不局限于内部俄罗斯文化再造和少数民族认同问题（纯粹从内部视角观察容易产生苏联片面彰显多样性的偏差），而是以攻为守、由外而内，通过输出革命、支持反殖民运动，从外部根除对俄国领土完整的地缘政治威胁。这一手法正是在支持“民族自决”的口号下展开的，也就是所谓的“革命皮德蒙特原则”。苏联幅员辽阔，族群众多，有着许多跨国界居住的民族，特别是在靠近芬兰、波罗的海沿岸、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亚、远东等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交通的敏感地区。通过赋予这些民族形式上的建国权力（以及自治区权力），苏联政权试图吸引其境外同胞回归，这样既可以增加劳动力以发展苏联经济，也可以给邻国造成政治冲击，增加苏联的外交谈判筹码<sup>2</sup>。苏联通过在原帝国边陲建立一大批形式上的民族国家，积极塑造自身作为世界革命执行人的形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国号暗示了苏联不设地理和族群文化的限制，所有国家和社会最终都能够加入这一国际主义大联盟<sup>3</sup>。

支持边疆民族自决也是革命者面对强权的“次坏”选择，以保证旧俄国边界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二月革命”后，波罗的海、波兰、乌克兰和高加索等边陲地区进入事实独立阶段，建立了领土国家。与此同时，英法德等外国干涉武力在反殖口号下扶持当地独立运动、发展民族语言教育。这些情况并不让莫斯科感到愉悦。对此，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数管齐下，一方面采取相同的反殖口号，支持这些政权内部的盟友抗拒外部渗透；一方面与土耳其、波斯等国达成协议，阻止西方力量进入相关地区，把多边关系简化为双边关系。在直接以外交努力阻挡西方大国之外，布尔什维克也争取少数民族来反对获得西方支持的白卫军。白卫军在话语上号召重建“不可分裂的俄罗斯”，致使其在芬兰、波罗的海、乌克兰、南高加索和中亚遭遇抵抗，甚至与英法支持者龃龉。在力量暂时不可及时，布尔什维克通过声援民族自决加剧白卫军的困难处境。对特定边陲地区民族主义的支持也有利于苏俄限制外国干涉，比如苏俄成功利用了亚美尼亚对土耳其、拉脱维亚对德国、白俄罗斯对波兰的反感情绪，将后者维持在对苏俄领土完整危害较小的程度<sup>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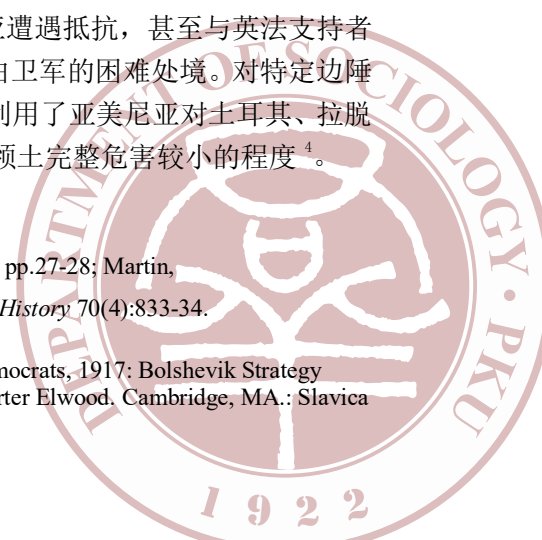
<sup>1</sup> Zhou, 2019.

<sup>2</sup> Marples, David. 2012. *Belarus: A Denationalized 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pp.27-28; Martin,

Terry. 1998.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0(4):833-34.

<sup>3</sup> Smith, 1999.

<sup>4</sup> Ezergailis, Andrew. 1976. "The Thirteenth Conference of the Latvian Social-Democrats, 1917: Bolshevik Strategy Victorious." in *Reconsiderations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dited by Ralph Carter Elwood. Cambridge, MA.: Slavica



当然，把苏联建国过程完全化约为为理性选择的策略性计算是错误的，苏联模式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执念和知识基础。发展民族语言权利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即时发明。沙俄时期的边疆学者、人类学家、人种志专家和“东方学家”在革命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知识，其中一些知名学者如语言学家马尔（Nikolai Y. Marr）的影响力更是辐射到了遥远的后革命时代。受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俄国东方学家在阿布哈兹、布里亚特等边疆区域发掘当地语言，编撰语法和恢复民间艺术；语言学者声称能够在高加索地区找到欧洲文明的源头。一些进步倾向的边疆学者还对佛教等边疆地区信奉的宗教予以正面评价，认为后者不同于基督教，能够成为公民精神的载体。这一边疆文化趋势的背后是俄国寻找民族认同的强烈动力，通过发现和彰显俄国的族群多样性，同时证明俄罗斯对亚洲的西方性以及西方文明内部的特殊性<sup>1</sup>。这些知识积累在革命前夕已经在学院和研究机构中制度化，在革命过程中则进一步与地方政权形成了紧密合作，进而影响到布尔什维克的政策选择。

苏联对民族革命的驾驭具有特殊的历史基础。沙俄是一个专制的落后大国，一些族群在革命前推行民族主义运动，然而或止于少数文化精英的自娱自乐，或脱离工农动员而一味追求分离自决、局限于狭窄的政治派别活动不能自拔，还有大量族群只有原始的初级认同。民族意识整体处于初始状态，使得革命和现代化成了认同形成和再造的契机，而认同重塑也可以反过来推动革命，将先前分散和内斗的族群纳入革命运动的洪流。彰显民族语言自主性、推动干部民族化可以部分满足民族权利诉求、彰显革命成就。沙俄在落后的同时，又是一个相对成功的现代帝国。历经数百年推动的早期现代化铸造了地区之间的共同市场、经济联系和交通通讯基础设施联结，俄罗斯和边疆地区彼此有了较深的经济依赖和人员共居，难以通过快速的革命运动切断。因此，苏俄可以在时机成熟时运用武力优势摧毁边疆地区的独立政权，将这些区域重新纳入苏俄版图。最重要的是，苏俄革命恰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动荡重组。面对俄国辽阔纵深的国土环境，外部势力的干预既不持久也不坚定，这是苏联能够迅速收回大部分领土的原因，也是其在接下来数十年中需要继续应对多族群问题的缘起。

## 二、维繫：超越族群多样性并构筑一体化

对苏联模式的主流批评，即“反向帝国”（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理论和“历史的报复”理论（Revenge of the Past），是针对苏联模式的自掘坟墓倾向——通过制度化地培育民族主义，让国家机器不堪重负，终于为自身的解体铺平道路<sup>2</sup>。按照上述理论，苏联自始至终是一座巨型的民族主义孵化器，一步步将自己架上了喷发的民族火山。“反向帝国”和“历史的报复”理论有诸多弱点，比如认为所有民族意识的觉醒都是苏维埃国家有意为之，忽略了苏联由于战争、移民和镇压造成的非期然民族形成。这一理论最主要的盲区是苏联对统一性的维护。自苏联成立之日起，它的历史就呈现为一种双重反向运动——既要制度化地持续发明民族、唤醒族群意识，又要从政治上将这些日渐被唤醒的民族牢固地聚合在一起。这对矛盾构成了苏联民族模式甚至整个政治、经济、外交体系演变的动力。苏联民族政策既是发明和再造民族的历史，也是现代帝国驾

---

Publishers; Minassian, Anahide Ter. 1996. "Nationalism and Socialism in the Armen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1897-1912)." in *Transcaucasia,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hange: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rmenia, Azerbaijan, and Georgia*, edited by Ronald Sun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Reynolds, Michael A. 2011.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nyder, Timothy. 2003.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up>1</sup> Tolz, Vera. 2011. *Russia's own Orient: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Oriental studies in the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Soviet period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up>2</sup> 参见 Terry Martin 2001 和 Ronald Suny 1993.



驭和利用民族主义的历史。

早在革命年代，苏联民族模式的内部隐患就已经呈现，即所谓的多样性困扰：一些独立较早的加盟共和国谋求自主的货币和外交政策、从语言文化角度构建民族所产生的巨大成本，经济上片面扶助弱势族群在斯拉夫民族中造成的疏离感和无畏牺牲感，执念于“共同地域”强制迁移少数民族产生的严重社会和生态问题，民族地区干部本地化形成的离心风险，以及文化民族演变为政治民族、政治精英与传统家族部落势力汇合的趋势<sup>1</sup>。鉴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再中心化”的诱惑从来没有停止。如何在非正式修改苏联联盟结构的前提下保持各民族的聚合，就成为苏联历代领导人和决策者始终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简单粗暴、也最引起外界注意的“再中心化”方式就是俄罗斯化。俄罗斯化起源于斯大林与列宁的著名冲突——前者主张所有族群都以自治区而非加盟共和国方式加入“苏维埃大俄国”，而后者坚持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盟<sup>2</sup>。这次冲突之后，再也难以见到正式制度层面取消联盟结构、俄国化的官方行动。斯大林全面执政时期产生了许多重要经验，其中之一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能够产生震慑，有效防止政治民族主义，把族群多样性限制在语言、文化、地域的“客观性”框架内；对乌克兰等区域领导集团和精英知识份子的清洗即是如此。伴随着集体化的清洗，苏联并没有终止干部本地化政策，只是警告这一政策必须服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优先性序列（即所谓的“硬线”和“软线”理论）。斯大林时期的另一经验是可以策略性地动员社会上存在已久的族群仇恨情绪，在特定政治议题上实现目标，比如苏联的工业化有意识动员了反犹太、反穆斯林和反乌克兰情绪<sup>3</sup>。此外，将民族问题置于其他议程内以淡化其优先性也是策略之一。面对日益增大的工业化和军事压力，苏联政权倾向于任用经过短期培训的俄罗斯人或俄语使用者，这就在实际执行中非期然地削弱了干部本地化政策<sup>4</sup>。

然而，俄罗斯化只是苏联维护统一性努力的很小一部分。延续“十月革命”后的逻辑，“俄罗斯性”仍然是被限制和再造的。苏联的策略是加固既有的族群联邦主义观念——分割政治经济和语言文化维度，在坚持政治主权和党组织统一的同时，把苏联建成“世界最优秀文化遗产庇护者”的“第四罗马”<sup>5</sup>。俄罗斯人在苏联具有符号性的统治地位，表现在俄语通用和俄罗斯文化的覆盖性，然而这种统治地位缺乏实际政治权力和结构的支撑——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没有自己的党组织、克格勃和科学院，内部还被划分为多个非俄罗斯自治单位<sup>6</sup>。斯大林时期彰显沙俄帝王和将军英雄事迹的举措被批判为恢复封建糟粕，与个人崇拜和沙文主义等量齐观。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还试图通过经济科技大跃进、赶超美国、重建十月革命的未来主义导向，以此彻底摒弃斯大林时期重拾沙俄历史人物、俄罗斯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化的“回向过去”路径<sup>7</sup>。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时期没有完全撤除对俄罗斯文化的支持，而是重点扶持一些斯大林时期以“落后性”为由被打压的民间艺术，强调其“进步”、“知识性”元素<sup>8</sup>。

<sup>1</sup> Applebaum, Anne. 2017. *Red famine: Stalin's war on Ukraine*. New York: Doubleday; Martin, 1998; Suny, 1993, *Revenge of the Past*; Mukhina, Irina. 2007.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outledge.

<sup>2</sup> V. I. Lenin, 2010, *Lenin's Final Fight, Speeches and Writings, 1922-1923*. New York, Pathfinder, Sections 2 and 9.

<sup>3</sup> Priestland, David. 2007. *Stal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Mobilization: Ideas, Power, and Terror in Inter-War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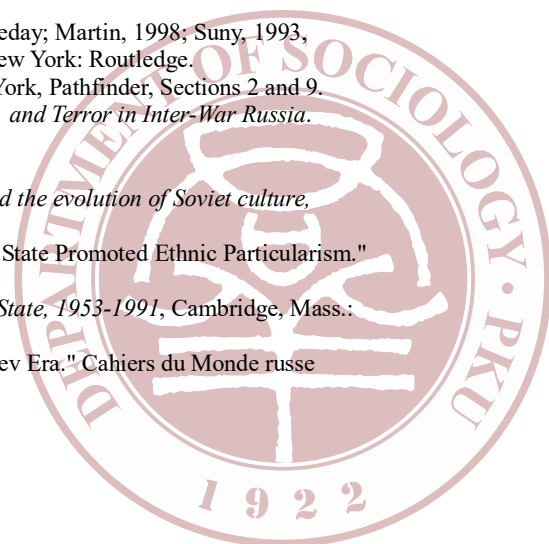
<sup>4</sup> Martin, 2001.

<sup>5</sup> Clark, Katerina. 2011. *Moscow, the fourth Rome: Stalinism,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culture, 1931-194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up>6</sup> Slezkine, Yuri. 1994. "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Slavic Review* 53(2):414-52.

<sup>7</sup> Brudny, Yitzhak. 1998. *Reinventing Russia: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Soviet State, 1953-199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up>8</sup> Jenks, Andrew. 2003. "Palekh and the Forging of a Russian Nation in the Brezhnev Era." *Cahiers du Monde russe* 44(4):629-55.



随着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一体化措施以更文明的方式进行，并且经常与其他议程并轨而更为隐蔽。出于经济建设需要，苏联积极整合曾经的边陲经济体，重建和扩大其与俄罗斯本部的联系，力求改变革命前产业分布“内轻外重”的格局。苏联在 1920 年代大力引进和发展经济地理学，组织专家学者对全苏疆域和蒙古进行大规模国土勘探，边陲地区由此被纳入全苏经济规划。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机械式理解，苏联政权不遗余力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力求在各族群、加盟共和国之间铸造难以分离的依存性。长期推行的“社会主义均等化”经济地理战略，追求减少落后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而把资源利用率、交通运输成本、区域比较优势等技术性效率问题置于次要地位<sup>1</sup>。苏联政权积极推动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开发，力求将这些族群推进到工业化阶段，从而建立它们对苏联其他地区的经济依存关系，并以此推进斯拉夫特别是俄罗斯技术人员的人口输入<sup>2</sup>。当然，“建立依附性”的措施既不都有刻意的反分离目的，也不总是得到惯性的推行。比如，赫鲁晓夫推行的农业垦荒运动由于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一度导致畜牧业发达的哈萨克斯坦成为肉类进口国，但这并不是刻意为之的建立依附性努力<sup>3</sup>。

行政区划上，苏联通过任意性的边界划定来防止分离主义，有时在加盟共和国境内密集建立其他族群的自治单位，有时则是合并自治单位。南高加索的加盟共和国最初以“外高加索联邦”形式“打包”加入苏联，利用亚美尼亚对工业资源的渴求限制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独立倾向<sup>4</sup>。一些重要的战略枢纽、出海口以行政飞地形式被刻意留在苏共中央直接控制的俄罗斯联邦辖区，比如加里宁格勒；而克里米亚在多次区划调整中始终没有并入毗邻的乌克兰。苏联还通过边界重划隔绝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境外接壤。二战前夕苏联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后，将这些领土划入西乌克兰，这样就实现了苏联对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陆地全包围<sup>5</sup>。苏联在中亚设立的五个斯坦共和国具有明显的人为边界性质，旨在建立多个新的民族认同，与革命前已经发生的人口同化趋势并不完全相符。这些共和国内部的自治区和自治共和国又在不停地调整、取消和重建。

军事防卫层面，苏联则有意识地采取了非均衡安排。在革命时期，许多非俄罗斯族群建立过独立的武装力量，布尔什维克政权也曾计划在部分边疆地区设置特种少数民族部队，充分利用其军事传统和熟悉地形的本地优势。不过这些设置逐渐取消，有些是因为少数民族武装在内战中自我耗竭、随兵员补充和武器升级换代转化为常规作战单位，有些则在 1930 年代被撤销建制<sup>6</sup>。例行化之后的苏军确保武装力量特别是高技术兵种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籍军人为主（海军则特别吸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天然水手”）；非斯拉夫人或者服役于次要兵种如内卫和边防部队（以便应对斯拉夫地区的社会抗议运动），或者在指挥层级中居于低端，或不得驻扎东欧，或者参军服役人数极少、在本地域没有军事院校等基础设施，或者几乎没有军事力量驻扎。军人被要求在远离乡土的地域服役，每个军事单位尽可能保持族群比例的固定配置<sup>7</sup>。

最激进的努力出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苏联在有限度俄罗斯化、“苏维埃国际主义”和缔造“苏联民族”三个选项之间摇摆与混合。如果说“苏维埃国际主义”是俄国革命和苏联建国

<sup>1</sup> Kirkow, Peter. 1998. *Russia's Provinces Authoritarian Transformation versus Local Autonom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sup>2</sup> Schroeder,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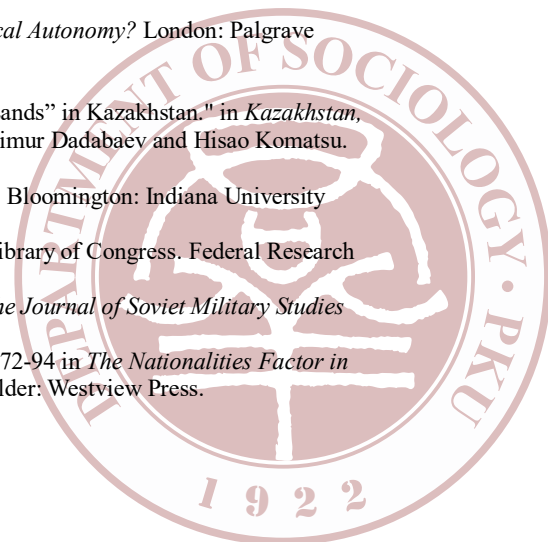
<sup>3</sup> Ercilasun, Konuralp. 2017. "Soviet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Cultivating "Virgin Lands" in Kazakhstan." in *Kazakhstan, Kyrgyzstan, and Uzbekistan: Life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Soviet Era*, edited by Timur Dadabaev and Hisao Komatsu.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sup>4</sup> Suny, Ronald Grigor. 1993. *Looking toward Ararat: Armenia in Modern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up>5</sup> Fedor, Helen. 1995. *Belarus and Moldova: Country Studies*.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p.106.

<sup>6</sup> McMichael, Scott R. 1990. "National Formations of the Red Army, 1918-38." *The Journal of Soviet Military Studies* 3(4):613-44.

<sup>7</sup> Rakowska-Harmstone, Teresa. 1990. "Nationalities and the Soviet Military." Pp. 72-94 in *The Nationalities Factor in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 edited by Lubomyr Hajda and Mark Beissing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的“原教旨”，那么有限度俄罗斯化是运用俄语、俄罗斯文化符号来同质化多族群共同体的保守方式，而缔造“苏联民族”则是对“苏维埃”概念族群化甚至种族化的激进尝试<sup>1</sup>。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一面是确保族群意识限制在文化和艺术层面，防止族群认同转变为挑战政治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些措施表现在：积极介入重塑和发明特定族群文化，建立人员组成多样化的管理机构，任用革命后培养的大学院校学生、族群宗教研究学者、大众动员积极份子来稀释原先的宗教和宗教社区领袖的势力<sup>2</sup>；重建族群文化、促使其与苏联制度和其他族群适应，对特定族群的革命前文化做了大幅修改，去知识化、去宗教化甚至去仪式化<sup>3</sup>，大幅引进革命前的下层文化、民间艺术来对抗“资产阶级”、“僧侣阶级”元素——这些“新传统”通常是对革命年代某些现代化左翼（如伊斯兰改革运动）的某种借鉴和继承<sup>4</sup>；切割非俄族群的境外联系——苏联可以利用特定族群对其境外同胞实施影响，但限制境外力量对苏联施加反向影响力；塑造内外有别的面向，对外展示苏联扶助非俄族群的正面形象、赢得第三世界反殖运动的好感，对内则限制族群意识的政治化<sup>5</sup>。苏联的改造确实创造了新传统，比如对伊斯兰教的社会主义改造混合了苏式共产主义理念和伊斯兰教义，并结合俄国特定区域的文化特征，以至在后苏联时期仍然保持着顽强韧性<sup>6</sup>。

苏联的对外战略延续了十月革命以攻为守、从边界以外保卫内部的思路。由此出发，彰显多样性的民族模式在苏联决策层看来反而是优势而非负担。即便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引发了严重的边境民族外逃现象，苏联政权仍然通过继续加强族群联邦主义、建立更多自治区来安抚在社会革命中受到重创的非俄罗斯人，从而既能够继续推进酷烈的经济社会改造，又能减轻在国际社会面临的合法性压力，保持苏联的意识形态优势。这一策略经过二战前的反复实践，在美苏冷战期间迎来巅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扩散与英、法、荷、西、葡传统殖民帝国的瓦解同步进行。美苏作为后起的侧翼大国，是反殖运动的受益者和推动者。遵循族群联邦主义原则（“文化民族”+ 亲苏国际主义），苏联以民族国家建设者自居，成为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化的推手——苏联把境内穆斯林作为武器，扩大在中东世界的影响力<sup>7</sup>。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这种行为在反殖浪潮、两极对抗年代具有普遍性。一战后的威尔逊主义、二战后美国的全球反殖运动、南斯拉夫和中国对反殖运动的介入都对苏联构成竞争，同时也合理化了苏联的以攻为守路线。

### 三、终结与遗产：后苏联空间的生存弹性

苏联解体被认为是苏联民族模式彻底失败的标志。然而，并不能因为苏联政权终结而否认一些重要事实：在看似自相矛盾的双重反向运动中，苏联毕竟稳定存在了七十年，其崩溃的触发机制并非民族问题，而是地缘政治压力下精英合法性丧失引起的自我毁灭性改革；苏联解体过程相对和平，没有像南斯拉夫和后殖民世界那样爆发全局性的内战；政治解体沿着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边界线发生，然后迅速稳固，并未陷入无休止的分裂；后苏联空间（Post-Soviet Space，指前苏联领土）主权国家之间残存着高度的一体化，这种统一性即便在欧盟和北约东扩的情况下仍保持着相当弹性；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表现出了更不受约制的新帝国主义倾向，频繁对前苏联“兄弟

<sup>1</sup> Weitz, Eric D. 2002. "Racial Politics without the Concept of Race: Reevaluating Soviet Ethnic and National Purges." *Slavic Review* 61(1):1-29.

<sup>2</sup> Keller, Shoshana. 2001. *To Moscow, Not Mecca: The Soviet Campaign Against Islam in Central Asia, 1917-1941*.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sup>3</sup> Yemelianova, Galina. 2015. "Islamic radicalisation A post-Soviet, or a global phenomenon?" Pp. 11-30 in *Radical Islam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dited by Galina Yemelianova. New York: Routledge.

<sup>4</sup> Khalid, Adeeb. 2015. *Making Uzbekistan Nation, Empire, and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USSR*.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up>5</sup> Yemelianova, Galina M. 2002. *Russia and Islam: A Historical Survey*. New York: Palgrave.

<sup>6</sup> Rubin, Dominic. 2018. *Russia's Muslim Heartlands: Islam in the Putin Era*. London: Hurst & Co.

<sup>7</sup> Bennigsen, Alexandre, Paul B. Henze, George K. Tanham, and S. Enders Wimbush. 1989. *Soviet Strategy and Isla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国家”使用经济杠杆甚至动用武力；苏维埃认同、跨国界认同在后苏联空间普遍存在，给后苏联国家的民族建设带来严峻挑战，在摩尔多瓦、亚美尼亚、东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更是造成了一众“事实国家”<sup>1</sup>。这些都提醒我们，苏联长期以来营造统一性的努力不是完全徒劳的，苏联在发明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多处布局；对苏联民族模式予以全面否定似乎为时尚早。

苏联解体过程中，精英对于民族主义是勉强接受而非热烈拥抱。族群问题只是政治精英推动斗争的工具，而非初始目标。苏联宪法规定各共和国具有主权，是苏联建国神话的一部分，用作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武器具有很高合法性；有深厚的经济交通一体化和军事镇压能力存在，民族主义将有助于削弱当权者，却不可能演变为成功的分离运动。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和叶利钦（Boris Yeltsin）都积极鼓动自下而上的地方民族主义，试图以此赢得地方支持、打击政治对手。这种革命思维一直延续到后苏联初期——为防止苏共捲土重来，叶利钦巩固延续了苏联遗产，实质性扩大各联邦主体主权<sup>2</sup>；俄罗斯也开放了境外组织对本土民族运动的支持，假定境内伊斯兰运动都已经世俗化、不可能带来分离主义威胁<sup>3</sup>。这些看法不是没有基础的——直到最后一刻政治精英仍然拒绝相信苏联会彻底解体，即便是最早提出苏联解体的斯拉夫核心国家，也没有一步到位地提出独立主权，而是坚持某种形式的联盟，如俄白乌斯拉夫联盟、俄乌二元国家、切割波罗的海三国而保留苏联剩余部分等<sup>4</sup>。

至于苏联长期构筑的基础设施、经济和防卫领域的一体化是否起到了预期作用，答案非常复杂。一体化的后果清晰存在，苏联解体造成了大面积的经济停滞和防务混乱。在苏联时期严格的部委垂直管理下，企业和区域之间缺乏制度化和正式化的资源交换。崩解突然到来时，它们瞬间需要面对从来没有遭遇的变局。即使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样输出技术和人才的经济核心成员国，面对突如其来的脱钩，也遭遇了供给和输出渠道断裂、管理经验不足、行政机构瘫痪、技术人口外迁等严重问题<sup>5</sup>。安全防务上则出现了继承国家集体性的训练和战斗力下降，许多实行军事硬脱钩的国家长时间不能建立有效的防卫能力，大量武器装备被倒卖、盗窃和抢劫，导致领土和族群争端暴力化<sup>6</sup>；毒品交易、走私、恐怖袭击等非传统威胁也集中爆发。严峻的后果迫使多数国家放慢步伐，不同程度回到某种集体安全机制，也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选择性干涉行动提供了机会<sup>7</sup>。苏联遗留在各加盟共和国领土上的俄罗斯移民、少数族裔则构成了重大问题，这些人口担心会成为继承国家推行民族同化的牺牲品，积极寻求母国的保护，又反过来加剧了新政权对他们的不信任。

影响一体化效果的因素是复杂的，无法归结到单一向度。首先，理性选择具有一定解释力。一个民族或族群在苏联基础权力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和卷入深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切割的代价。在苏联体系中占据关键位置的民族并不容易从技术上迅速脱离——尽管它们在话语上可以非常激进，但是这种激进会逐渐回到慢速甚至停顿状态，因政治家不堪承受巨大成本引起的公共压力和行政瘫痪。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有不少族群不遗余力地脱钩。其次，民族认同的影响力也不能否认。虽然在波罗的海、西乌克兰等地区反俄情绪没有消除，超民族的“苏联认同”也确实存在，

<sup>1</sup> Bakke, Kristin M., Andrew M. Linke, John O'Loughlin, and Gerard Toal. 2018. "Dynamics of state-building after war: External-internal relations in Eurasian de facto states." *Political Geography* 63:159-73.

<sup>2</sup> Zamyatin, Konstantin. 2016. "Russian Political Regime Change and Strategies of Diversity Management: From a Multinational Federation towards a Nation-State." *Journal on Ethnopolitics and Minority Issues in Europe* 15(1):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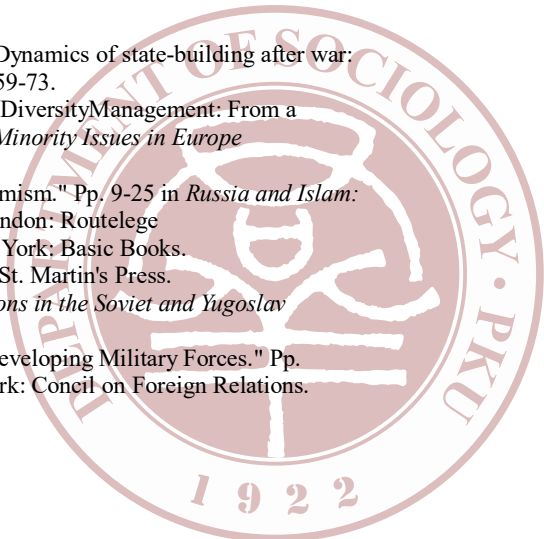
<sup>3</sup> Dannreuther, Roland. 2010. "Russian discourses and approaches to Islam and Islamism." Pp. 9-25 in *Russia and Islam: State, society and radicalism*, edited by Roland Dannreuther and Luke March. London: Routledge.

<sup>4</sup> Plokhy, Serhii. 2014.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sup>5</sup> Zon, Hans van.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ependent Ukrain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up>6</sup> Danopoulos, Constantine P., and Daniel. Zirker (Eds.). 1996.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Soviet and Yugoslav Successor Stat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sup>7</sup> Clark, Susan. 1994. "The Central Asian States: Defining Security Priorities and Developing Military Forces." Pp. 177-206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World*, edited by Michael Mandelbaum.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并与特定地区的区域认同结合在一起（比如苏联的“工业铁锈地带”），成为继承国家构建民族认同面临的挑战<sup>1</sup>。再次，预期的外部援助也非常重要。那些预期可以从文化相似度较高的邻国取得援助的民族国家（比如波罗的海国家之于北欧，犹太人之于以色列，德意志人之于德国，摩尔多瓦之于罗马尼亚），会不计代价地脱离苏联；反之，没有此类资源或预期的国家则继续倚靠俄罗斯和前苏联体系<sup>2</sup>。

一个地区在苏联解体时经历的动态过程也是影响脱钩的重要因素。一些激烈的脱钩行为实际上是无经验互动触发的。苏联时期一体化措施的设计假定体系处于稳定状态，而无法应对民主化、主权分割、战乱、地缘政治重组等无法预测的情景。苏联解体过程总体和平，但在局部地区的内战、边界冲突和叛乱仍然致使一些政权迫切需要分割苏联遗产，以获得立即可用的作战和经济自持能力，而另一些地区则由于独立而需要独自应对近邻的传统安全威胁和新生恐怖主义<sup>3</sup>。至于这种需求如何影响脱钩，又与一个民族国家原先的技术和人力储备有关。苏联的“工业化边陲”和跨加盟共和国移民项目对阻滞脱离的作用也是多面相的。在中亚地区，俄裔和工业人口都在反对货币去卢布化扮演了积极角色，而在波罗的海他们被当作间谍率先成为当地政权驱逐或强迫归化的对象<sup>4</sup>。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苏联重度经营了工业体系和军事部署。当地精英因此相信可以占据这些资源用作独立谈判的筹码，甚至将其转换为军工、旅游疗养资源盈利。此外，每个政权的政治特质也会影响脱钩轨迹。权力集中程度、对社会压力的敏感性、精英的行政经验（不少后苏联精英是没有政治经验的前异见人士或草根选举领袖）等，都会影响一个政权对脱钩进程的判断<sup>5</sup>。

在个体层面，一体化的后果也显示出复杂性。苏联政权鼓励跨族群通婚，认为这类婚姻可以淡化族群认同，实现“苏维埃民族融合”，而战争造成的移民、城市化、无神论教育和混居模式也确实塑造了大批跨族群婚姻。然而，这些通婚对子代族群认同的影响是多层次、不平衡的，取决于地域、通婚族群在苏联民族体系中的等级序列等多种因素。在中亚共和国，与俄罗斯人通婚产生的跨族群后代更倾向于认同当地的“加盟共和国民族”；在白俄罗斯等国，此类婚姻则产生了俄罗斯认同；俄罗斯人与“非加盟共和国民族”的通婚强化了俄罗斯认同<sup>6</sup>。大量散居在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在苏联解体后并没有形成完全同质性的跨国界民族认同，因而也不像二战前的德国移民那样成为母国渗透、重新收回“旧疆界”的工具。不同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因其社会地位不同，选择了不同层次的归化程度和策略，有些则不堪忍受新政权迫害少数族裔的反向民族主义而迁出<sup>7</sup>。语言对认同形成的作用也十分复杂——前苏联各个时期都存在大量俄语流利但坚持本民族认同的非俄罗斯居民<sup>8</sup>。

后苏联空间（post-Soviet space）统一性的重要推动力是俄罗斯。相比苏联时期隐晦、受制约和再造的“俄罗斯性”，俄罗斯新帝国主义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公开，意识形态内容上则日渐保守。俄罗斯国族建构与普京（Vladimir Putin）的个人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包含着诸多复杂因素，包

<sup>1</sup> Szporluk, Roman. 1998. "Nationalism after communism: reflections on Russia, Ukraine, Belarus and Poland."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4(3):301-20.

<sup>2</sup> Luyang, Zhou, 2020. "After Empire: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1992 and 1993."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33(3):1-18.

<sup>3</sup> Beissinger, Mark. 1997. "State Building in the Shadow of an Empire-State." Pp. 157-85 in *The End of Empi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S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Armonk, NY: M. E. Shar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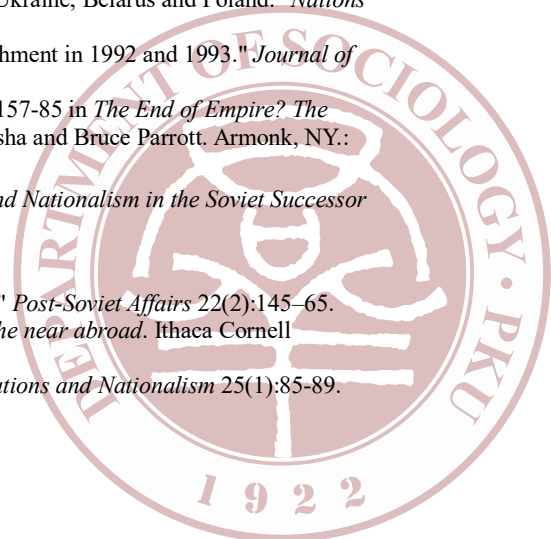
<sup>4</sup> Chinn, Jeff, and Robert Kaiser. 1996. *Russians as the New Minority: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Republic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

<sup>5</sup> Zhou, 2020.

<sup>6</sup> Gorenburg, Dmitry. 2006. "Rethinking Interethnic Marriage in the Soviet Union." *Post-Soviet Affairs* 22(2):145-65.

<sup>7</sup> Laitin, David. 1998.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up>8</sup> Tolz, Vera. 2019. "Communicative Integration in Nation-States and Empir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5(1):85-89.



括个人崇拜的威权统治、君主制的仪式和审美，以及男性气概<sup>1</sup>。对“男性气概”的推崇不仅构成普京个人的合法性基础，还拓展成了对俄罗斯整体国家形象的男性化赞颂（masculinity），以及对俄罗斯周边对手带有贬低性质的女性化<sup>2</sup>。普京治下的官方民族主义还宣扬被革命废弃的保守价值观，弘扬父权制、反同性恋运动，以及东正教传统。俄语作为后苏联区域建构的重要工具获得官方支持，但延续了苏联末期的“街头风格”——在削弱了政治攻击性的同时，也纳入了大量黑帮语言、俚语和脏话<sup>3</sup>。透过冲突制造“他者”也是塑造民族认同的方式。俄罗斯彻底官方化了民间存在已久但苏联时期受到压制的反乌克兰情绪。普京将乌克兰塑造为俄罗斯的重要对手，在宣传上把乌克兰颜色革命与法西斯运动、新纳粹相联系。这些做法在2014年俄罗斯夺占克里米亚时达到巅峰，之后则演变为绵延不绝的东乌克兰战事。

#### 四、结论：革命、帝国与民族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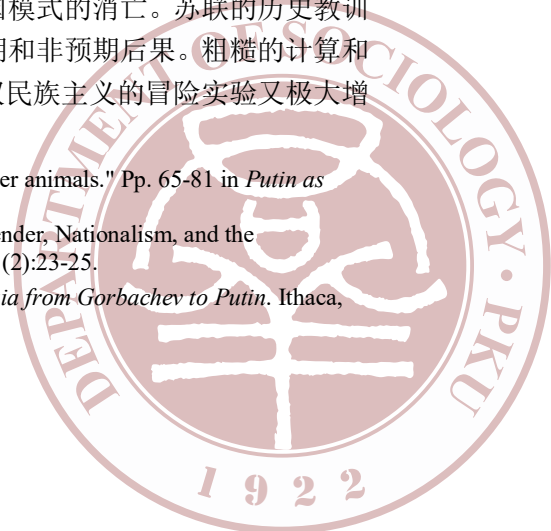
1922年后的整个苏联历史即是俄国革命的漫长延续，是一场试图驾驭和操控民族主义的实验。显而易见的是，这场实验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终结。目前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美俄关系、欧俄关系出现新动向，断言苏联模式彻底失败、欧亚空间分崩离析为时尚早。本文勾勒了一幅革命借用帝国结构驾驭和操纵民族主义、同时以民族主义改造传统帝国空间的历史画卷。苏联的历史经验表明，帝国是民族主义背后的推手。面对民族国家崛起的压力，帝国远比城邦、部落等小型传统政体更敏锐也更有回旋余地，能够以退为进、以攻为守，把自身打造为民族解放的旗手，通过驯化民族国家大幅增强自身的生命力。在世界范围内，苏联的这一创举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众所周知，民族主义兴起于十九世纪后半叶，但长期受制于巨型帝国的霸权。直到冷战时期各传统帝国相继解体，世界才逐渐转型为民族国家体系。美苏争霸在这一历史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美苏都以反殖革命建国，地缘上处于传统欧洲侧翼外围，接近欧洲海外殖民地；作为后起国家，它们有动力通过反殖赶超和取代传统霸主。在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号下，美苏在原殖民地世界争夺人心，推动民族主义革命，建立亲苏/亲美的新兴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最终形成与苏联模式密不可分，正是美苏这样的全球帝国最终奠定了民族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

苏联经验亦表明，民族问题只是帝国政治大棋盘中的棋子之一，民族问题既不是帝国的唯一关切，也不能决定帝国的生死。在革命大框架下，帝国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综合立体的，民族认同的培育镶嵌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革命性社会结构改造和地缘政治博弈等诸多议题中。民族问题在苏联大部分时期处于边缘，被气势恢宏的社会改造、经济建设、边疆开发、战争行动所遮蔽，苏联的革命输出和全球扩张更是让许多早先的边疆成为了安全的内陆（比如东欧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后的西乌克兰）。综合的帝国国家建设构筑了强大的结构，使得单纯的民族意识觉醒并不能导致帝国的瓦解。沙俄垮台和苏联解体后的历史还表明，个别帝国政权的衰亡绝不等同于帝国核心控制力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帝国共同空间的消失，更不等同于帝国模式的消亡。苏联的历史教训在于，帝国对民族主义的操纵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混合着预期和非预期后果。粗糙的计算和意外的事件，都可能导致帝国入不敷出、被民族浪潮反噬，而驾驭民族主义的冒险实验又极大增

<sup>1</sup> Mikhailova, Tatiana. 2013. "Putin as the Father of the Nation: His family and other animals." Pp. 65-81 in *Putin as celebrity and cultural icon*, edited by Helena Goscilo. New York: Routledge.

<sup>2</sup> Riabov, Oleg, and Tatiana Riabova. 2014. "The Remasculinization of Russia? Gender, Nationalism,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Under Vladimir Puti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61(2):23-25.

<sup>3</sup> Gorham, Michael. 2014. *After Newspeak: Language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ussia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加了帝国协调内战、外交、经济、军事的复杂性，加大了腐化、发展失速和体制僵化的概率。复杂的民族关系平衡牵制着苏联的经济模式、外交战略和军事布局。苏联开创了传统帝国应对民族主义的新模式，但在现代国家建设的综合能力上弱势显著，这是其驾驭民族主义不能完全得心应手的最主要原因。

## 【论 文】

### 美国福音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发展趋势<sup>1</sup>

周少青<sup>2</sup>

**摘要：**福音民族主义是美国国家（民族）主义在 21 世纪的新表现。其对内主张国家认同与基督教信仰相融合，宣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对外奉行“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福音派早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活动集中反映在所谓“大觉醒”的宗教复兴运动上。20 世纪 70-80 年代兴起的道德多数派是福音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的演练或尝试。2016 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标志着美国福音派等保守主义由一种宗教保守力量，发展成完整形态的民族主义。应对美国内外部条件巨变、传统保守主义策略调整、白人种族主义的复兴、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的互搏以及美国现代性危机是福音民族主义崛起的重要条件或历史背景。随着美国面临的内外矛盾的相对缓和及保守主义策略的相应调整，特别是随着公民民族主义阵营力量的增强，福音民族主义的动能将进一步减弱，但是另一方面，从“认同与终极信仰”的视角来看，尽管随着美国内外部条件的舒缓，以“文化战争”为表征的认同问题会相对纾解，但作为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与信仰支撑的“基督教国家”，福音民族主义的韧性仍将十足。福音民族主义将继续在美国内政和外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福音派；福音民族主义；国家认同；公民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大体说来，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发展大致经历了教派（天主教、基督新教 [Protestanism, 下称“基督教”]）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三个阶段<sup>3</sup>。作为“例外论”的典型国家，美国的民族主义显示出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独特发展路径。众所周知，美国的创建始于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之间的联合。但是推动它们联合起来发动独立战争并最终创立美国的力量，并不是推动西欧民族国家构建的那种民族主义力量。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也不是为了追求类似西欧民族国家的基于族裔、语言、文化或宗教身份认同一致性的民族主义目标；相反，它的目标是“自由主义”和“普世主义”。用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话来说，独立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自由”的“理想”；为了守护“一个国家的自由”，潘恩甚至断言“没有美利坚，就没有整个世界（Universe）的自由”<sup>4</sup>。1784 年，政论作家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牧师大力颂扬美国革命，称之为“一场为了普遍自由的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传播了“对人类权利的正当情感和对合法政府的天然追求”，激发了

<sup>1</sup> 本文刊载于《二十一世纪》2021 年 12 月号，总第 188 期，第 38-55 页。

<sup>2</sup>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sup>3</sup> 参见周少青：“论两个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意义”，《西北民族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8-28 页。

<sup>4</sup> 潘恩还声称，美利坚人所捍卫的自由远胜过古希腊罗马的自由，因为她“摒弃了对他人的奴役”。Thomas Paine, “The Crisis, No. V”, i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Vol 1, (Middletown, NJ: G. H. Evans, 1837): 131; 149.

